

改革开放以来甘青地区地名研究述评

许若冰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甘青地区地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学术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学术转向。学者继承了古代沿革地理注重对古地名考证的研究传统，并将蒙、藏等少数民族语地名作为研究特色，同时注意挖掘地名蕴含的区域文化内涵，丰富地名研究的面相。但当前的研究仍存在理论方法单一，学术视野有限，对地名变迁与区域社会关系探讨不足等问题。今后甘青地区地名研究首先应当建立甘青地名信息系统服务于学术与社会，同时将地名置于甘青地区整体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注意挖掘地名及地名变迁所反映的区域社会人群关系，进一步推进甘青地名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甘肃 青海 地名 研究

地名是基于地理空间、行政区划所表现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真实反映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地理环境、社会宗教、语言文化以及族群互动关系，并构成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表征。因而，地名研究成为我们探寻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把钥匙。中国传统地名研究属于历史沿革地理研究范畴，注重利用文献史料对古地名进行考证；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性的地名普查与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促使历史地理学者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地名学理论^①，史念海、陈桥驿、邹逸麟、史为乐、周振鹤、华林甫等学者先后发表一系列有关地名学的定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论著；同时，诸多全国性的地名材料相继出版。^②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活动，各省市的地名研究工作逐步启动，甘青地区的地名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直缺乏对研究现状的总结与反思。有鉴于此，我们将对当前甘青两省的地名研究现状进行爬疏与思考，以期有益于地名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一 甘青地名研究的学术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甘青地名研究主要经历了两大时期，其学术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即20世纪80—90年代在甘青各级政府地名普查工作指导下进行的地名材料的整理与编著工作，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当时甘青学界响应政府部门的号召，积极对本区域内古地名进行考证研究，同时兼及民族语地名的考察；第二阶段即进入21世纪，伴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甘青地名研究也发生文化转向，学者们更加注重对地名文化内涵的发掘与研究。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地名研究

甘青地区的地名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地名普查工作，同时形成了一

^① 陈雄的《论地名学研究》（《中国地名》1999年第2期）就认为，地名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这种说法混淆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研究的概念。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研究、地名学三者关系密切，但具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与问题意识。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② 如丁莉等主编：《中国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高俊良等主编：《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学习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书都系统记载了全国各省市地名信息。

批专门的地名材料与地名志。1979—1980年，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号召下，甘肃各地开展对境内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普查与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具体由各县级人民政府主持进行以区县为单位的地名调查并汇编地名材料。1983年，兰州市安宁区、城关区、白银区相继编写完成《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地名资料汇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地名资料汇编》以及《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地名资料汇编》；同年，甘肃华亭县地名普查办公室编写《甘肃省华亭县地名资料汇编》，全面梳理该县的行政区划居民地、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文物古迹等地名信息。1985年，会宁县人民政府主编的《甘肃省会宁县地名资料汇编》收录会宁地名4642条，详细介绍县属各公社、林场、古迹、工厂等名称。以上资料均属内部材料，另外还有其他各区县地名普查资料尚未公开。90年代以后，有关甘肃地名的材料才逐渐公开出版，如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和《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①详细记载秦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州地区的行政沿革与建置区划等地名信息。

青海地名排查与整理最初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进行，并编写完成《青海地名初编》^②，由此拉开青海地名材料编写的序幕。进入80年代，青海省各州县开始对境内地名进行普查，并组织人力编写地名志，如湟中县地名办公室主编的《青海省湟中县地名志》对该州县下各行政区、自然地理实体进行全面而详细的介绍；海西州地名办公室主编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名志》更成为海西州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地名工具书。随后，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西宁市志·地名志》^③分别从西宁市的自然地理实体、政区居民区、路街巷沿革、水利工程、名胜古迹、古遗址纪念地、主要企事业单位以及附录八大部分，全面介绍西宁市的地名情况。另外，严正德与王毅武主编的《青海百科大辞典》^④以及青海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编的《青海百科全书》^⑤都记载了青海省境内各州县的行政区划、城区街道、乡村聚落、交通路线以及山川河流等地名信息。上述地名汇编材料为此后的甘青地名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通过上述地名材料可以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地名研究尚处在官方主导下对地名信息的采集与辨识阶段，相关成果主要为政府部门开展基层工作服务，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色彩。同时，由于地名调查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停留在宏观的地名汇总层面，尚不足以形成学术性成果。但这些地名资料汇编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推动了地名研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各类甘青方志、游记文集等传世文献，如《秦边纪略》《甘肃通志》《西北行记丛萃》等文献对甘青地名也略有提及，同时期的王仁康、刘满、薛方昱、王宗元、王昱等学者，也在积极利用上述文献材料并兼顾田野调查方法，对甘青古地名进行细致的考证研究，基本厘清了甘青各地区重要地名的历史源流与演变关系；同时，席元麟、韩建业、马成俊等学者也注意到对民族语地名的考察，丰富了区域社会的研究成果。

（二）21世纪以来的甘青地名研究

21世纪以来，地名研究不断走向纵深，学术路径亦发生转向，学者们在延续地名考证与民族语地名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地名文化内涵的探索与发掘。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地名考证

① 焦北辰主编，《甘肃省》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商务印书馆，1995年；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主编：《青海地名初编》，《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21）》（内部资料），1978年。

③ 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主编：《西宁市志·地名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

④ 严正德、王毅武主编：《青海百科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⑤ 青海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编：《青海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研究由大型城址转向更加微小细致的文化遗址研究,民族语地名研究更加突出对民族关系的探讨。同时,对地名文化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新的学术潮流,甘青地名研究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可喜的是,少数学者已经开始利用人类学、地理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地名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必须承认的是,21世纪以来的地名研究也存在较多的研究瓶颈,如学界对甘青地名的关注度与研究力度大不如前,出现研究乏力、视野有限、成果稀少等窘境,这些问题亟待学界进一步解决。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甘青地名研究,其学术脉络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学者们延续了古代沿革地理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对古地名的考证研究,同时形成以蒙、藏等民族语地名为特色的研究取向,并逐步挖掘地名蕴含的区域社会文化内涵,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截至2018年年底,相关研究论文达150多篇,下面我们将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梳理。

二 甘青地名研究的学术议题与相关成果

甘青地名研究在经历了地名材料的长期积累后,相关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如前所述,众多学者利用文献材料与田野调查方法对甘青古地名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同时部分精通民族语言的学者,开始关注甘青地区各类蒙、藏等民族语地名及其含义;新时期以来,学者们积极扩展地名研究的内容,逐步转向对甘青区域地名文化资源的挖掘,将地名研究推向纵深。

(一) 关于甘肃、青海古地名的考证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的甘青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古地名的考证。学者首先针对两汉时期金城郡治所允吾城的地理位置展开争论,同时探讨历史时期令居县、金城县、榆中县以及相关河流的地理方位,王仁康、刘满、薛方昱、王宗元、王宗维、吕叔桐、王昱等学者都参与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提升了甘青地名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其一,对两汉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城址的考证。1978年,王仁康发表《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①,考证出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在湟水南岸并紧靠郑伯津,即今大通河以东、庄浪以西甘肃境内湟水入黄河附近的永靖县北。刘满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允吾县在青海民和县下川口附近,而郑伯津在今下川口北的湟水边上。^②随后,王仁康对刘满的看法进行批驳,并补充允吾在永靖县北的观点。^③对于以上两位学者的讨论,张大可通过实地调查,认为上、下川口以及之间的马集垣具有设置城邑的条件,张文轩与蔺子武也认为允吾城在下川口。^④此后,薛方昱也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汉代金城郡治所允吾县在今湟水和黄河之间的民和县北古城。^⑤陈守忠则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勘察提出允吾城在今永靖县盐锅峡乡黄河北岸方台上的古城遗址。^⑥经过多年的争论,学界对允吾县在民和县下川口地区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

① 参见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② 参见刘满:《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③ 参见王仁康:《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④ 参见张大可:《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张文轩:《汉代金城郡治及其考证》,《兰州学刊》1981年第4期;蔺子武:《汉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⑤ 参见薛方昱:《两汉金城郡治允吾故址究竟在何处?》,《兰州学刊》1983年第2期。

⑥ 参见陈守忠:《两汉允吾、金城再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其二,学者们对汉代令居县及逆水、涧水地理位置也有分歧,主要有薛方昱的连城水磨沟说^①、王宗维的咸水河中游说^②、赵鹏翥的永登县城西北说^③与向红伟的永登县城说^④等观点。通过精读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令居县的位置分歧主要是由于对涧水的考证差异,薛方昱认为涧水为大通河;王宗维认为涧水为咸水河;向红伟认为涧水为庄浪河,逆水指咸水河;同时,王宗元就指出《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错误地将乌亭逆水和涧水当成湟水的支流,考古遗迹证明逆水和涧水是对今庄浪河不同河段的称谓,他认为汉代令居城在庄浪河东岸的永登县。^⑤另外,王昱与崔永红对令居塞的设置时间进行考辨,认为令居塞是在元鼎六年(前111)由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所建^⑥,对以往学者们认为令居塞是元狩二年(前121)由霍去病建造的观点进行批驳。

其三,对历史时期金城县与子城县的地名关系、榆中县地名沿革的讨论。如刘国元、吕叔桐认为隋朝金城郡的治所为西魏北周时的子城县,地点在榆中王家崖附近;同时,隋朝在今兰州城区设五泉县作为金城郡的辖县,唐朝兰州府的治所是将隋朝的子城迁徙到五泉县,并在贞观年间改名为金城县。^⑦娄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北周子城与金城郡无关,应属临洮府,随后迁到今兰州城关区作为金城郡治,此后一直延续。^⑧对此,刘满认为汉代金城县一直在今兰州市城关,否认金城县在后来由西固城迁到兰州城关的说法。^⑨我们看到,围绕金城县与子城县地名关系的讨论限于材料不足,学者们众说纷纭,相当复杂。另外,吕叔桐、杨永发等学者还针对榆中县地名进行考证。吕叔桐、牛丽红的《古代榆中考》梳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榆中县的地理沿革,认为汉代的榆中不在今榆中县内,而在今东岗镇附近,今榆中县是由金代的金州沿袭而来。^⑩杨永发、侯桂秀则根据《水经注》《寰宇通志》等文献对榆中县址的不同记载,提出榆中县两迁说^⑪,他们认为榆中故城在大通河下游(兰州西),曾一度内迁至现位置(兰州东南),民国时以“榆中”为金县命名,榆中城又回到现在的位置。当然,随着考古发掘与出土材料的增多,相关讨论仍然有待进一步进行。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讨论对我们理清甘青地区各县的名称来源及其演变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其四,对山川河流、故址遗迹、交通线路、卫所堡寨、关津等地名的考证。20世纪90年代,薛方昱连续发表数篇关于甘肃地名研究的文章。^⑫如《陇山源名考》考证出陇山本意为龙

① 参见薛方昱:《汉代令居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② 参见王宗维:《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兰州学刊》1985年第1期。

③ 参见赵鹏翥:《令居何在之我见》,《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④ 参见向红伟:《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⑤ 参见王宗元:《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汉金城郡乌亭逆水、涧水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⑥ 参见王昱、崔永红:《令居塞建立时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⑦ 参见刘国元、吕叔桐:《隋金城郡治地位考》,《兰州学刊》1984年第5期。

⑧ 参见娄昉:《也说隋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隋代金城郡治地位考〉商榷》,《兰州学刊》1996年第1期。

⑨ 参见刘满:《汉金城县治所地理位置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⑩ 参见吕叔桐、牛丽红:《古代榆中考》,《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

⑪ 参见杨永发、侯桂秀:《“榆中”名源及城址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⑫ 参见薛方昱:《陇山源名考》,《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薛方昱:《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薛方昱:《唐宋成纪故址及秦安县名考》,《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薛方昱:《街亭故址考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山,源于古羌语“朝那”;同时对邽县中的上邽的设置、地理位置及其与清水等地的关系进行详细研究;另外,薛方昱还注意到历代秦安县的建置演变,他认为北宋设安夷镇,金初设秦寨,金正隆二年(1157)分别取秦寨与安夷镇首字,设秦安县并沿用至今;而在《街亭故址考辨》一文,作者考证出三国时期著名的街亭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25华里的恭门乡上城子。此外,日本学者佐藤长与周宏伟分别考证甘青河流的古地名。佐藤长认为古时的“河西九曲”位于今青海共和县境内的乌兰不拉克河谷^①;周宏伟提出古代的浩亶水、门水以及乳骆河都是指今大通河。^②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类小型的历史文化遗址地名更加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如李济阻与蔡副全就关注杜甫诗句中的甘肃地名。李济阻对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中提到的南郭寺、东柯谷、陇坂、隗嚣宫进行考辨,基本理清了这些地名的方位^③;蔡副全考证了杜甫《发秦州》诗中的“汉源”是在乾元元年(758)由“上录(禄)改名汉源”,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并指出泥功山北麓是杜甫由秦州南入同谷的必经之路。^④同时,刘满则注意到秦皇、汉武帝西巡的路线,他考证出秦皇、汉武帝登临的空同、鸡头实为一山,即今六盘山的主脉大关山,鸡头道是由今宁夏泾源县香水河谷翻越大关山到陇山以西的道路。^⑤值得一提的是,李得贤也曾梳理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西巡的路线,并对其经过的临津关、拔延山、长宁川、金山、星岭与覆袁川等地名进行考证。^⑥这些历史遗迹的考证研究对当前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如南郭寺、泥功山、鸡头山、临津关等遗址已经成为著名的景区与地方文化名片。

陈新海、邓明、妥超群、王蕾等学者则关注甘青地区军事堡垒、天津与卫所等地名。首先,陈新海对青海湟水两岸的堡垒进行分析,揭示其与明代卫所屯田活动的密切关系,同时分别从人文与地理因素层面分析堡垒名称特点。^⑦邓明则具体介绍了兰州各城堡的名称与形制演变及其战略地位。^⑧另外,妥超群与刘铁程通过对青藏高原地点命名规律以及对史料的重新解读,考证出毕力木江应是青海湖布哈河,修正了吴均等学者所持毕力木江为通天河的观点,同时初步确定曲先卫地望及相关地名的位置。^⑨值得一提的是,王蕾从军事防御角度认为北周将金城郡治迁至汉代的金城县(今兰州城关)引发了区域政治军事中心的东迁,并促使隋代设立的金城关成为通往凉州、临州、河州等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⑩这种学术关照有助于将地名研究引入更加宏观但不失深刻的思考。

(二) 甘青地区的民族语地名研究

青海地区是西北各少数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区域,并留下了丰富的民族语地名,这些地名概

① 参见[日]佐藤长,张铁纲译:《再论“河西九曲”之地》,陈庆英、耿昇、向红笳等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7—60页。

② 参见周宏伟:《浩亶河、乳骆河与大通河:关于大通河历史名称的新发现》,《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③ 参见李济阻:《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④ 参见蔡副全:《杜甫陇右诗两地名考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⑤ 参见刘满:《秦皇汉武帝巡幸陇右地名路线考释——兼论历史上的鸡头道》,《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⑥ 参见李得贤:《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考实》,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56—267页。

⑦ 参见陈新海:《明代兴屯戍边与青海地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⑧ 参见邓明:《兰州军事地名考释》,《档案》2001年第6期。

⑨ 参见妥超群、刘铁程:《毕力木江考——明代曲先卫地望及相关地名新证》,《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⑩ 参见王蕾:《金城津、关的设置及其交通路线》,《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以及复杂的族群互动关系。因而,民族语地名成为青海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特色。相关研究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由地方史专家半一之开启的,他将青海各州、市的命名划分为地理方位、藏语名称、政治含义3种类型,同时对青海各县的汉语、羌语、藏语、匈奴语、蒙古语地名进行梳理,显示出青海复杂的族群关系。^①随后,魏庭玉论述了青海藏族、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的活动对当地地名历史演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青海地名的特点与命名形式。^②进入90年代以后,席元麟、贾晞儒、韩建业、马成俊、苏都必力格、吉乎林等学者分别阐述青海藏语、蒙古语、吐谷浑语、撒拉语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文化内涵,民族语地名研究得以蓬勃发展。

甘青民族语地名研究名家,当推席元麟。20世纪90年代,席元麟发表一系列关于青海民族语地名研究的文章,他分别以民族语地名为切入点探讨青海地名起源、特色以及地名与民俗、民族之间的关系。^③如《青海几个地名语源辨析》一文,对拔延山、伏俟城、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地名起源进行分析,同时注意到青海地名中的民族语地名特色、汉语地名特色以及混用语地名现象^④;地名语言分析是民族地名研究的主要方法,席元麟就从语言学角度论证青海阿尔泰系古代民族语地名的族居问题,同时考证伏俟、慕贺、车我真等地名,他发现古代吐谷浑语地名与土族语音相近,提出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观点。此外,席元麟还注意到青海地区一个自然地理实体拥有几个不同民族语命名的名称,并尝试以地名透视民族关系,颇具启发意义。

青海藏语地名研究。唐中叶以后,中原王朝的力量基本退出西北地区,甘青区域社会亦处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并迎来全方位的“吐蕃化”风潮,随后数百年间吐蕃后裔也持续在青海地区活动,因而留下了众多的藏语地名。1982—1984年,任乃强与曾文琼在《西藏研究》上连续发表6篇名为《〈吐蕃传〉地名考释》的系列文章,全面对吐蕃地名进行梳理,其中就有部分涉及青海;随后学者们开始对藏语地名进行专题研究,如陈新海对“丹噶尔”地名进行考证,认为“丹噶尔”一词来源于藏语“东科尔”,最初为中康的地名,后来指称活佛,再次转为寺院名即著名的东科尔寺,清代开始将“东科尔”转译为“丹噶尔”。^⑤同时,邢海宁与耿显宗分别对“果洛”一词进行考察,认为“果洛”原为部落名,藏语意为“反败为胜的英雄”,清代称为“郭罗克”。^⑥另外,宋秀芳考证《宋史·地理志》中有关河湟地区的吐蕃语地名^⑦;谢光典则以唐与吐蕃在甘青地区的交往为线索,论述大小宗哥(tsong k ache chung)由小地名扩大到整

① 参见半一之:《青海地名探源及若干规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参见魏庭玉:《青海地名命名的历史背景与特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③ 参见席元麟:《试析青海地名语言特色》,《青海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青海几个地名语源辨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青海高原阿尔泰系民族迁徙与地名语探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从青海民族语地名透视民族关系》,《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按,韩建业也在研究中关注到青海由两种以上民族语构成的混合地名以及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的现象。参见韩建业:《青海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特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⑤ 参见陈新海:《丹噶尔地名探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⑥ 参见邢海宁:《谈果洛地名》,《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耿显宗:《果洛藏语地名命名特点及历史文化蕴涵》,《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⑦ 参见宋秀芳:《宋代河湟吐蕃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探讨》,《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主编:《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203页。

个湟水流域的过程，同时论及布薪贡（vbu shing kun）的设立与野摩塘（dbyar mot hang）地理位置的演变过程。^①近年来，叶拉太利用敦煌古藏文文书对吐蕃地名进行考释，并以此观察吐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他首先注意到多康地区的古藏文吐蕃地名有吐蕃赞普王朝时期出现的新兴地名，也有受周边其他民族语言影响而借用的外来语地名。有鉴于此，他认为古藏文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藏民族与周边民族互相往来、移居、文化冲击所造成的。^②毫无疑问，这些地名信息能够为历史时期复杂的族群互动关系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空间。

青海蒙古语地名研究。13世纪以后，蒙古人渐次进入青海环湖一带及海西地区游牧，并成长为甘青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蒙古语地名。贾晞儒、苏都必力格、呼和等学者都曾对蒙古语地名进行研究。首先，贾晞儒总结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命名方式，地名的语言及语义结构特点，并详细介绍蒙古语在青海地名中的应用。^③苏都必力格则关注《钦定西域同文志》中记载的蒙古、藏、汉三语“青海属地名”。这些地名不仅揭示了清代蒙、藏族群的分布状况与文化交流，也为历史地理和地名释名研究提供了参照，作者以“青海属山名”部分地名为例，对蒙古语和蒙藏合璧地名的特点进行归纳、分类和研究。同时，他发现汉文文献中提及的柴达木均与蒙古人有关，蒙古文献中所提到的青海属“柴达木”一词为蒙古语常用地名，在蒙古人活动地区多有分布。^④值得注意的是，奥群拉毛的《近代以来环青海湖地区的蒙语地名研究》^⑤是近年来少有的全面详实的对青海蒙语地名进行考察的文章。作者从历史地理学与语言学角度分析环湖地区蒙语地名和藏语地名的特点，并描述环青海湖地区的地名与环湖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文章集中探讨环湖地区地名中的蒙古元素，论述地名与民族、移民、军事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揭示出环湖地区地名的命名特征及地名中存在的问题。另外，呼和也对青海蒙古语地名中有关人物传说、历史遗迹进行介绍，阐释其人文意义、地域特点与旅游文化的价值。^⑥

马成俊则关注撒拉族地名的来源与命名方式。他首先对撒拉族聚居区地名命名方式进行归类，分为按地区地理位置特点命名，如苏瓦西；按历史传说命名，如奥土贝纳赫；按撒马尔罕的社会组织——孔木散命名，如乃曼；按该村特有工匠类型命名，如阿什匠；按当地特产命名，如查汉都司等，揭示出撒拉族地名异常繁杂的命名特征。随后，作者分别对循化县查汗都斯乡、街子乡、积石镇、孟达乡、清水乡以及白庄乡下辖的76个撒拉族村落的地名进行考察，基本厘清了循化地区的撒拉族地名。^⑦另外，薛方昱与乔高才让还对甘肃诸多羌语地名进行探讨，他们提出“兰州”一词源于古羌语“皋兰”，意为石羊出没的山路，庄浪为地名野牛沟，古浪为地名黄

① 参见谢光典：《公元七至九世纪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历史地名研究——以宗喀（宗哥）、布薪贡与野摩塘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参见叶拉太：《敦煌古藏文文书所见多康地区部分吐蕃地名考释》，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171页；《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所反映的古代民族情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参见贾晞儒：《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几个特色》，《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参见苏都必力格：《〈钦定西域同文志〉青海属山名类型刍议——以蒙古语、蒙藏合璧地名为中心》，《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3期；《青海“柴达木”地名语源辨析》，《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3期。

⑤ 奥群拉毛：《近代以来环青海湖地区的蒙语地名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⑥ 参见呼和：《青海蒙古语地名传说考》，《西部蒙古论坛》2015年第1期。

⑦ 参见马成俊：《青海撒拉族地名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循化撒拉族村落名称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羊沟,乌支、月支等均为古羌戎部族名。^①如前所述,这些来源复杂的民族语地名暗含着区域族群关系的某些侧面,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甘青区域人群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三) 甘青地名与地域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之一。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地域人文观念最直接的表达,有学者就尝试透过地名观察区域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如于小秦通过总结甘肃县名的命名规律与特点,认为甘肃县名表现出边地文化、生态文化、绿洲文化、山地文化及民族文化等综合性特征。^②白晓霞则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在甘肃地名的传说故事,她认为地名传说不仅可以解释语义,而且表达了民众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共建与共享。^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古城遗址名称、山水名称与村落名称的各类传说都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并承载鲜活饱满的民间心理。

兰州是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人群活动密集,各类地名丰富,备受学者的关注。早在1986年,赵世英就根据兰州地名的来源、含义及其新生名称,将兰州地名的命名方式分为山水形态、人群姓氏、历史人物典故、美好愿望、与城中距离、名胜古迹、商业市场等9类,并梳理了兰州地名的历史沿革演变。^④兰芳进一步细化到对兰州市区街道地名沿革的考察。^⑤同时,梁贵仓与张建军则关注兰州地名的文化特征。梁贵仓根据兰州的地名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提出兰州地名具有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四大特征^⑥;张建军也分析兰州地名的命名方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心理特征。^⑦另外,文博聚焦于武山县的地名语言文化,他运用文献考证、语言信息分析等方法探讨武山县地名的命名、含义、分类、演变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悠久历史文化与独特地理环境。^⑧值得注意的是,崔明借鉴人类学视角对“庄浪”一词的形成进行探讨,他认为庄浪一是今兰州市永登县的旧称,二是指今平凉市庄浪县。这两处地名的来历不太可能是北方庄浪族或积石地区庄浪族迁移的结果,而可能与唐天宝年间吐蕃文化的侵入有关。^⑨作者尝试在地方性知识认知转变的视角下理解地名,为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青海民族语地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成为我们观察区域民族社会的一面镜子。陈亚艳就探讨民族地名在青海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史上的意义与作用^⑩,正如贾晞儒所讲“民族地名为我们描绘出民族形成及其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画卷,同时也反映出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发展与变化”^⑪。同时,谷晓恒与席元麟都透过民

① 参见薛方昱、乔高才让:《甘肃古代羌语地名探讨》,《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于小秦:《甘肃县名初探》,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③ 参见白晓霞:《简论甘肃地名传说的类型化特征及其承载的民间心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④ 参见赵世英:《兰州地名浅识》,《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

⑤ 参见兰芳:《从地名沿革管窥历史上的兰州》,《档案》2012年第3期。

⑥ 参见梁贵仓:《从兰州的地名特征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中国地名》2010年第10期。

⑦ 参见张建军:《兰州地名命名的文化心理特征》,《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⑧ 参见文博:《甘肃武山县地名语言文化初探》,《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⑨ 参见崔明:《甘肃“庄浪”地名的历史人类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⑩ 参见陈亚艳:《地名与青海民族史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⑪ 贾晞儒:《试论青海民族语地名之研究》,《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族语地名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如谷晓恒从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成分探求青海地名蕴含的丰富的文化背景^①,席元麟则通过民族语地名的命名与产生,分析地名与民族历史、宗教、心理和民俗的关系,挖掘其多元的文化内涵。^②另外,吉乎林的数篇文章都对青海蒙古语地名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他认为蒙古语地名与青海各民族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族迁徙等有密切的联系,并提出地名研究不仅可以窥视民族迁徙的历史和线路,也成为研究地理实体的地貌特征和乡土文化、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对整个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挖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学术意义。^③

近年来,张鹏丽与李育使用 ASTER 30 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 并提取兰州市周边所有的地名信息,通过地名与地貌分析,发现兰州地名命名及分布基本可以反映兰州市的地形地貌,并指出兰州地名类型的分布随高程呈现出一定规律,作者运用地理信息技术,以兰州市为例对我国地名命名和地貌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益的探索。^④此外,张庆有的《青海地名考释》分别对西宁、乐都、平安驿、大通县、玉树、果洛、格尔木、德令哈、湟中、同仁、循化、贵德等县的名称来源进行解释。^⑤王宗元、黎宗华、卢宗义等学者也都有文章对甘青地名进行有益的探讨^⑥,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赘述。

三 甘青地名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纵观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甘青地名研究,其研究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内容在延续古代政区沿革地理研究的传统,同时加强了对地名与区域文化以及民族语地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应当指出的是,当前地名研究仍然存在理论方法单一、学术视野有限、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且至今没有形成一本专门探讨甘青地名的学术专著。下面我们就如何进一步开展甘青地名研究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建立区域地名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术体系。这也是当前中国地名学研究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梳理从事甘青地名研究者的学术履历,我们看到学者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的研究角度进行地名研究,相关研究方法与理论也都属于其他学科,区域地名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方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青地名研究的发展。未来的地名研究如何在与其他学科的借鉴与交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理论与方法?如何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探寻现代中国区域地名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些课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掌握民族语言的同时,注重现代地理科学新技术的应用。甘青地区存在丰富的民族语地名,从事地名研究的学者应当具备藏语、蒙古语、吐谷浑语等语言学知

① 参见谷晓恒:《青海民族语地名结构特点及文化意义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参见席元麟:《青海民族语地名民俗蕴涵二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③ 参见吉乎林:《浅谈青海蒙古语地名之文化内涵》,《西部蒙古论坛》2009年第1期;《青海蒙古语地名文化学解读》,《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青海蒙古语地名文化表征解析》,《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④ 参见张鹏丽、李育:《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分析——以兰州市为例》,《人文地理》2015年第5期。

⑤ 参见张庆有:《青海地名考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⑥ 参见王宗元:《甘肃省地名综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黎宗华:《青海地名说》,《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卢宗义:《青海地名谈趣》,《中国地名》2008年第3期等。

识,同时继续借鉴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各类地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丰富甘青地名研究的面相。与此同时,地理科学技术是当前地名研究的潮流与趋势,这恰恰也是当前甘青地名研究最为缺乏的,相关研究仅有张鹏丽与李育基于数字高程模型对兰州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的分析。因而,我们呼吁地理学、测绘学、计算机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甘青地名研究的行列,并借助本学科技术优势,运用 EOF 模型、空间分析,图层叠加与对比、地名与各要素的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拓宽甘青地名研究的领域与视野。

第三,在整体史视角下进行甘青地名研究,注意挖掘地名及地名变迁所蕴含的社会因素。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断受到区域地理条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甘青地区地名的产生和演变与各少数民族的互动与交往关系更加密切。但应当指出的是,当前的甘青地名研究过于注重对地名概念本身的静态考察,忽视了地名以及引发地名变迁背后的各类社会文化因素。因而,今后的研究应当在甘青区域社会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地名的意义,注重地名与区域环境变迁、族群互动、经济发展、宗教活动、移民军屯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地名与区域社会有机联系起来,并尝试为今后西北区域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只有将地名研究置于这样的关照下,才能把甘青地名研究打造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而推进甘青区域地名乃至中国地名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建设甘青地名信息系统,增强地名的应用性,服务于学术与社会。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将繁杂的地名信息数字化,政府部门应当联合科研单位并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建设甘青地名信息系统,按照时间脉络将甘青地区的地名与区域地图进行有机对接,同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展现历史时期甘青地区地名数量与密度的增减、地名分布的变迁趋势以及影响地名的各类因素等内容。这些地名信息数据库,一方面可以服务于甘青民族史、区域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弥补传统文献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开发甘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方便民众检索与查询,让地名研究真正为方便民众生活、实现社会发展服务,充分体现地名研究的公益特征与社会价值。

第五,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发掘并弘扬区域社会文化。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甘青地区众多的老城区面临转型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部分城市街区命名也趋于现代化,许多蕴含丰富历史信息、见证城市发展进程的老地名趋于消亡。因此,应当保护并传承甘青地区的老地名,充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张敦田与袁斗成相继在《兰州日报》上呼吁保护兰州老地名,留住地名文化,在新街区命名中也体现出地名文化内涵,让老地名成为兰州的文化名片。另外,地名是地方性知识的集中展现,甘青地区保留的民族语地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但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很多民族语地名往往被人们曲解,严重伤害了民族情感。因而,应当充分挖掘民族语地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其命名方式、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兄弟民族社会文化的正确理解与认知。总之,探索并弘扬甘青地名文化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与反思。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詹利萍